

「史学史研究」文选

中国古代史学卷

(上)

总主编◎杨共乐 本卷主编◎汪高鑫

「史学史研究」文选

中国古代史学卷

(上)

总主编◎杨共乐 本卷主编◎汪高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史研究》文选·中国古代史学卷·上 / 汪高鑫主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080-9055-9

I. ①史… II. ①汪… III. ①史学史—文集 ②史学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K091.53 ②K 09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5654 号

《史学史研究》文选·中国古代史学卷·上

总主编 杨共乐

本卷主编 汪高鑫

责任编辑 杜晓宇 王 敏 董秀娟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394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 hxph. com. 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史学史研究》文选顾问委员会

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吴怀祺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向燕南 李 帆 杨共乐
张昭军 汪高鑫 张 越
周文玖 易 宁 董立河

序

今年是《史学史研究》创办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来，《史学史研究》在培养青年史学研究人才，发表原创性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初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史学史资料》，不定期出刊，1964年7月停刊，共出九期。1979年复刊，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1年再次更名为《史学史研究》，由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楚图南先生题写刊名，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史学史研究》首任主编为白寿彝先生（1981—2000），主要编辑人员有朱仲玉先生、瞿林东教授、吴怀祺教授、陈其泰教授和许殿才教授等；第二任主编为郑师渠教授（2001—2009），主要编辑人员有吴怀祺教授、许殿才教授、易宁教授和汪高鑫教授（2007年起担任编辑部主任）等；第三任主编为杨共乐教授（2010至今），副主编为李帆教授和易宁教授，编辑部主任为汪高鑫教授，主要编辑人员还有许殿才教授、向燕南教授和周文玖教授等。现主办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承办单位为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史学史研究》作为发表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编纂学研究成果的专门刊物，是国内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主要理论阵地。刊物开辟的栏目非常丰富，主要有：专论、中外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人物志、方志学、史林偶拾、书刊春秋和读书会等。近年来，栏目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增加了“历史理论”专栏，更加重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将中国史学发展史细化为“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三个栏目，不但使中国史学发展史的阶段性更为清晰，内容更加丰富，

而且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揭示了中国史学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在“外国史学”栏目中，重视引介西方学人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观点，重视对中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比较研究；通过“学术信息”栏目，及时报道海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与研究动态；等等。本刊不但一贯重视刊发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家的学术成果，发挥学科研究的引领作用，而且重视提携后学，中青年学者论文刊用比例较高，为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了大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专门人才。

长期以来，本刊一直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史学研究。尽管政治气候经常变化，却能保持不受政治风浪的影响，不迎合时尚，不追赶潮流，不搞实用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者不只是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所以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积极开展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引领学术发展方向。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重视学术求真，追求刊文的原创性，反对言之无物。提倡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对于作者来稿，要求既要有正确的、独到的理论观点，又要充分地占有史料，强调理论与资料的结合，也就是要“言必有物”。

本刊关注理论热点与学术前沿问题，及时反映理论动态。通过“专论”“历史理论”等栏目，发表了大量反映理论前沿动态的文章，起到了引领学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本刊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有：史学在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义、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历史的二重性、历史上统一规模和统一意识、历史教育、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唯物史观、历史规律、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人类精神的觉醒、历史观念、文化反思、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历史文化认同传统以及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其时代性非常鲜明，密切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认识。

本刊在历任主编、主要编辑人员和史学所、历史学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为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在海外也有较高知名度的学术期刊。在国内，本刊通过刊发大量高质量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文，已经成为全国高校

和科研单位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发表学术观点的重要平台。同时，本刊重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政治影响。本刊 1999 年第 3 期刊发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写给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的贺信，祝贺其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这是教育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江总书记关于史学工作重要性的重要论述，是对史学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对促进史学研究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海外，本刊发行到美、俄、英、法、德、意、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而且对当地学者了解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状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 年，本刊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对国外代理中国出版的九千多种期刊中排名前五十位，被该公司评选为“2015 年度中文报刊海外发行最受海外机构欢迎期刊”。

1992 年，本刊在全国首次中文核心期刊测定中入选为历史类中文核心期刊，此后每评选皆得入选，现为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源刊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HSPCD）期刊源刊物、美国《历史文摘》（*Historical Abstracts*）和《美国：历史和生活》（*America: History and Life*）摘要与索引的来源期刊，并进入期刊方阵，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双效期刊。

在此刊物创办五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在认真研读《史学史研究》全部刊文的基础上，分类选辑，精心出版《〈史学史研究〉文选》，内容包括《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上、下）、《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和《人物志》（上、下），共七卷，旨在展示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历程。我们对我们的前辈和作者深怀敬意，我们对我们的刊物充满信心。我们将以更大的热忱把《史学史研究》办好，办出水平，办出影响。

杨共乐

2016 年 9 月 25 日

目 录

白寿彝

1 中国史学的童年

杨翼骧

11 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

斯维至

28 古代史官与典籍的形成及其作用

张孟伦

37 孔子和中国古代史学

李学勤

56 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

吴怀祺

65 说《周易》的变通史学思想

晁福林

77 西周时期史学的发展和特征

林晓平

92 先秦诸子论历史盛衰

翦伯赞

105 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

- 侯外庐
- 110 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
- 白寿彝
- 117 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
- 任继愈
- 134 司马迁的哲学思想
- 齐思和
- 145 《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
- 刘家和
- 152 《史记》与汉代经学
- 杨燕起
- 171 司马迁的《史记》与中国史学的自觉
- 易 宁
- 184 论《史记》释《尚书·西伯戡黎》
- 冉昭德
- 198 班固与《汉书》
- 赵光贤
- 208 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
- 陈其泰
- 219 《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

- 戴晋新
238 班固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
- 汪高鑫
253 董仲舒与汉代史学思潮
- 许殿才
265 两汉时期的历史盛衰总结与政治
- 缪 钱
276 陈寿与《三国志》
- 陶懋炳
285 陈寿曲笔说辨诬
- 赵俪生
291 《十六国春秋》、《晋书》载记对读记
- 乔治忠
302 孙盛史学发微
- 束世澂
315 范晔与《后汉书》
- 向燕南
326 《魏书·释老志》的史学价值
- 牛润珍
333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

- 王志刚
353 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
- 王俊杰
366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 高 敏
395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
- 王锦贵
407 编年体史书在传统史籍中地位的升降
- 瞿林东
416 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

中国史学的童年

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应该了解这门学问。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还没有树立起来。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史学史包括什么内容呢？第一，要研究历史观点、历史理论的发展。第二，史料学的发展。第三，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第四，历史文学的发展。历史工作者最大的任务是写历史，要把历史过程写的准确、鲜明、生动，群众爱看，这就必须研究历史文学的发展。第五，研究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史学的历史是比较古老的。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人类有了记忆，就有了历史知识。人类有了意识，就有了对历史的看法和理论，这就是史学的开端。

中国史学的童年，是讲秦以前的史学史。

一、神和跟神交通的人

史学史从神开始。人们最早认为神创造了世界和历史，而跟神交通的人，即那些宗教家，是最早的历史家。从远古的传说可以知道，当时人们认为人类和人类社会都是神创造的。如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说，东南方的天塌了一角，女娲炼五色石把天补起来了。大地上到处是洪水猛兽，女娲树起四根柱子把天擎起，制服洪水猛兽，人类才得以安居。这个女娲不会是人，而是神。又如黄帝和蚩尤打仗的故事说，黄帝是北方部落的首长，蚩尤是东方部落的

首长。黄帝打不过蚩尤，因为他能呼风唤雨。于是黄帝请了天女制住风雨，才打败了蚩尤。后来，人们都把黄帝和蚩尤看作战神。还有大禹治水的故事，也把禹看作神或是半人半神。相传禹的降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他母亲吞了一种植物的种子生了他；一说是他的父亲死后三年尸体不腐，有人用刀把他父亲肚子剖开，生了他。大禹治水，遇山阻路，于是化为大熊，开通山路，他妻子送饭时看到后，感到羞耻，化为石。后来把石破开而得子，就是启。周代的后稷也是神，他是农神。相传后稷的母亲踏了巨人的脚印而生后稷。

这些故事从远古流传下来，中间有加工，但不是假造，反映了部落的情况。传说里的神都是为人民利益做事的，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有威信，得到拥护就成神了。这是最早人们对历史的看法。

到商代，有了甲骨文的记载。商的每代王都是神，商王和神是二位一体的。活着的时候管活人，死后还管死人。商代的神不是为人民群众的神了，而是统治者。这种观点至少是统治者的意识。当然许多群众也有这种看法。后来周王灭商，周神比商神进步，认为周是天的儿子，商也是天的儿子，但天不喜欢商这个儿子，而喜欢周这个儿子。商代的神与自己的祖先统一起来，他的权威只限于商。周代的神不限于周的氏族部落，而是大家共同的神，带有“世界”性。周族有神，别族也有神，但同属于周的至上神，即周的祖先。各族的神与周的祖先有统一、有分离。各神中，谁不好好干，至上神就不喜欢他。这样，就从一个部落的神变为“世界”性的神了。这是一个发展，即由第一步，为群众做事的神；到第二步，代表统治者的部落神；到第三步，“世界”神。这种变化是社会变化带来的。

西周以后出现了新的历史观点，认为历史主要是通过人的历史行为来决定的。这是一个进步。当然，春秋战国时也有认为历史是神决定的。直到今天，不是还有人认为历史是统治者、英雄决定的吗？马列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西周以后的新历史观点当然不是马列主义观点，但却比神意史观进步。

历史工作者最初是搞宗教活动的。刻甲骨文的贞人就是最初的史官。史官记载的完全与宗教有关，如打猎、打仗，王去什么地方，先占卜吉凶，然后写上结果：王怎么样。这是宗教活动。史官的职责就是沟通神与王的意志，

看到天上有何现象，主吉主凶，要告诉王。当然有科学知识问题，古代科学与宗教不分，但主要是宗教。甲骨文记载的东西包括历法和文字。古代史官必须懂得历法以掌握时间，还要会写字。历法和文字是历史出现的最初的两个必要条件。史官在统治者身边，对他们的活动，他可以记录。这就是原始写历史的史官的职务。

史官记事，态度正直是一个优良传统。如《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五年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令太史改，太史坚持不改，被杀死了。又换其弟为太史，还是不改，又被杀了。后来他另一弟弟来换，还是坚持，没有再被杀。这件事古来传为美谈，言其不惧权威，宁可掉头也要坚持按事实写历史。当然，这不能跟我们坚持马列主义去比，因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认为自己是神和人的交通者，自己的职责是神圣的职责。

二、历史记载的萌芽

历史记载的必备条件有：一时间、二地点、三人物、四历史过程。这是简单的记载。再进一步就是系统的、有意识的记载。

甲骨文是最早的历史记录。这不是说对刻甲骨文的人都可以认为是在写历史，当时他们不过是在进行宗教活动。现在看甲骨文是很好的历史资料，但也只是历史记载的萌芽状态，有时记日，有时记月，记事很不完整。

到了西周，记录文字多起来了。钟鼎上铸字叫作金文。里面有年、月、日、事情。铭文后面多有“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样的话，其目的是有意识要用文字记载传其宝物。但金文片片段段，就事论事，时间记载也不完备，从中看不出历史发展情况。

在甲骨文、金文以外的历史记载，有《诗经》和《书经》。《诗经》是文艺作品。从历史记录的要求来看，不行。但反映了别的历史记载所没有的东西。如《诗·生民》《诗·公刘》等篇就写了周朝最初创立的情况，实际上有了历史人物传记的雏形。《诗·江汉》有了记事本末的味道。所以从体例上看，《诗经》有些开创的东西。《书经》不同，好多篇章是政治文献，记录了君臣

对话，实际是一部政治文件汇编。但有些篇章记事记的很好。如《书·顾命》，写周成王病重，交代后事，成王死后，康王即位，大臣引康王进入后堂，君臣对话的情况。事件虽然复杂，作者利用时间顺序、空间位置，写得有条有理，气氛庄严。这是很好的历史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载。

总的来看，这段时间的历史记载不完备。

到公元前 841 年，周王朝有了按年记载历史的情况。从此以后，中国历史基本上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差不多能够每年可查了。公元前 841 年前后，楚、齐、燕、晋、蔡、陈、宋，都有了明确的纪年。这点很奇怪，为什么同时出现这种情况？这和生产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有关，但具体原因还不清楚。公元前 841 年确实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中国有这样早、这样完整的历 史纪年，为全世界历史上所仅见。

到《春秋》开始的那一年，即公元前 722 年，中国历史有了更详细、更完备的记载。《春秋》的出现，是中国历史记录新阶段的开始。

三、孔子和《春秋》

关于孔子的评价，现在还是个问题。有的大学教师讲孔子，还是心有余悸。讲的好点，又怕不行；全盘否定，又怕说是“四人帮”影响。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是批他的错误，不等于全盘否定孔子。要批判那些在今天看来不正确的地方。全盘否定是“四人帮”搞的，以批孔为幌子，反对周总理。结果，弄得连孔子也不敢叫，叫孔老二。这似乎是贬低他。其实，他字称仲尼，就有老二的意思，说不上贬不贬。我看，我们还是按照习惯，叫他作孔子吧。

孔子在史学上有很大贡献。他是鲁国郷邑人。曾祖父是宋国的大贵族，后来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失败，跑到鲁国，一代一代没落。孔子早年曾为公家管过仓库，放过牛羊。从他整个历史和生活看，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以个人名义收学生、讲学。孔子之前，可能也有私人讲学。但是在树立规模、形成风气等方面，私人讲学可说是从孔子开始的。他有三千弟子，数字不一定准确，也不会相差太远。一个教师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在今天也很可观。

吧。他要求学生要会讲、会驾车、会射箭等，文武全才。相传孔子的学生中有七十几贤人，其中最突出的有十人。从出身看，十人中至少有一半不属于上层家庭。最大的弟子颜回很穷，子路也穷，都不是贵族。私人讲学是与西周制度不合的。送点干肉就可以当学生，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礼的违犯。孔子讲学和周游列国这两件事，都是周礼所不允许的，反映了社会大变动时期自由人（国人）的要求。自由人既非奴隶又非奴隶主，他们要求过问政治，参加社会活动，是当时社会中一股新生力量，不能低估。当然也有其软弱性。前几年批孔子“学而优则仕”，是把孔子庸俗化了。其实，学习好了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像我们今天，努力学习、关心四个“现代化”，有什么不对？当时，孔子的学生子张问他怎样可以做官？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学好了，就可以做官。

孔子的思想是矛盾的。他出身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又反映了新兴的自由人（国人）的政治要求。后来，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是从孔子开始的，这点要充分肯定。

孔子对历史有兴趣，晚年整理了好多典籍，如《尚书》《春秋》《易经》《礼》《乐》，都是古代的文化遗产。经过他的手，传给弟子，流传下来。这方面的功劳也应肯定。他在教育史上、文化史上，都有贡献。

孔子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他虽然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局部的变化，他也有局部的适应能力，但看不见根本的变化。只看到量变，看不到质变。只看见局部，看不到全貌。他也往前走，但留恋过去。他认为过去的历史变化不大，从夏到商，从商到周，只有局部的变革。认为将来也是这样。因此，孔子成为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人物。这也是孔子思想上的矛盾。这种矛盾集中反映了西周末年以来社会大变化中，旧的势力还很严重，新的势力还摆不脱旧的影响的情况。要批判孔子就批判他保守的一面。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思想不可能真正解放，随着历史的前进，他就被丢到后面去了。

我们讲史学史，不是全部评价孔子，而是着重讲他的历史观点，评价《春秋》这部著作。《春秋》这部书是否为孔子所作，有争论。我们认为可能是孔子的著作，但不排除后人改动的可能。《春秋》在史学史上是有地位的。有了《春秋》，编年史雏形就具备了。《春秋》记载历史有时间、地点、人物

的活动，但是太简单，看不出当时的议论、事件的因果关系，只保留了题目。所以还是不够完整的编年史。《春秋》是第一部私人写的史著，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这一点来说，孔子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家。

从历史观看，在两个问题的处理上，可以反映不同历史家的态度。一是人与神的关系；一是王道与人事的关系。孔子对鬼神观念持保留态度，他说“敬鬼神而远之”，不是相信，也不是不相信，模棱两可。《春秋》记了很多灾异天象，但对这些不正常的天象与人事有什么关系，不表态。这比当时周、齐、宋、燕等国国史那样详记鬼神和《左传》那样详记灾异要好，甚至比后来汉代专有一派大讲灾异的都好。所以司马迁说《春秋》“纪异而说不书”。《春秋》能够从神秘的空气中游离出来，专门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历史，是进步的地方。孔子在对待王道和人事的关系上，是有矛盾的。孔子讲王道，是按周礼讲的。另一方面，他又注重人事，人事中又特别注重人才。如讲管仲和齐桓公，对他们是称赞的、肯定的。

汉代人讲《春秋》有四个字：“属辞比事。”“属辞”，就是讲究文法、修辞，恰当地表达历史事件。如战争，用“伐”字；杀人，用“弑”字，都有讲究。“比事”，就是按年排比。《春秋》是历史上第一部编年史，在思想上、编纂上都粗具规模，我们给它肯定的评价。但不能太高，只能说，历史记载在思想上、写法上仅仅有了一个萌芽。

四、《国语》和《左传》

《国语》这本书，著者、年代不可考。现在看，大约是战国前期的东西。里面收录了各国记载的原始材料。看来编者是加了工的，记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各国历史。周是第一位，鲁是第二位，楚、吴、越在最后，还按周和诸侯的关系安排了次序，而且诸夏在前，蛮夷在后。这个次序可以说是战国初期的看法，到了战国中期、后期就改变了。

《国语》的编排反映了孔子一派的思想。它有好多特点。战国以前，各国有各国的历史，如《春秋》是《鲁春秋》。《国语》就不同了，把好几国的历